

第三篇 後南島視野下的 東馬樹皮布工藝 田野調查與創作 轉譯報告

田野訪談、節慶參與與場域觀察之紀錄與初步探討

2025/06/16-06/22





摘要

此計劃提出「後南島」作為一種從田野調查轉向創作實踐的轉譯方法，而非既定的文化理論框架。此方法並不以建立單一南島敘事或比較體系為目標，而是透過實地行走、材料接觸與工藝實踐，理解不同社群中持續變動的關係狀態。轉譯並非將調查結果轉化為視覺符號，而是保留田野中未完成、未被明確言說的部分，使研究行動本身成為創作的一部分。透過此方式，創作被視為延續田野關係與跨社群交流的行動起點，而非研究的最終呈現。

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



作為一名來自台灣、以樹皮布進行創作並持續進行田野觀察的創作者，我對南島文化脈絡的理解並非建立在既定結論之上，而是在多次實地接觸、比較與反思中逐步累積。這樣的理解始終保持開放，並隨著不同場域、不同工藝實踐者的經驗而被修正。正因如此，此計畫並不試圖為樹皮布工藝提出一個單一、穩固的定義，而是希望透過當代田野經驗，呈現其在不同社群中持續變動的狀態。

樹皮布作為南島語族分布範圍內廣泛存在的纖維工藝形式，長期以來被視為連結身體、土地與文化的重要媒介。然而，在既有學術研究、博物館展示與公共論述中，樹皮布往往被放置於「傳統」、「過去」或「儀式性遺留」的框架之中，較少被理解為仍在當代社會中持續被製作、使用與調整的生活實踐。這樣的敘事傾向，使樹皮布容易被視為一種已完成的文化標本，而非一項仍在回應現實條件的工藝行動。

特別是在東南亞地區，相較於太平洋島嶼中較為完整的研究體系，關於樹皮布的當代實踐紀錄顯得零散且片段。多數研究聚焦於歷史來源、族群分類或典藏物件，對於工藝在今日如何被實際製作、如何進入社群生活、又如何在地市場、政策與文化活動中被重新定位，著墨相對有限。這樣的研究落差，也使得樹皮布在當代語境中的複雜性，未能被充分理解。

基於上述背景，本研究將視角轉向馬來西亞東部砂拉越（Sarawak）Lawas 地區，聚焦於倫巴旺族（Lun Bawang）社群的樹皮布工藝實踐。選擇 Lawas 作為田野場域，並非因其被視為某種「保存最完整」的典範，而是因為在此地，樹皮布並未完全退出生活場域，而是以婚禮贈禮、節慶服飾與文化展示等形式，持續被製作、使用並賦予新的功能。這樣的存在狀態，使其成為觀察工藝如何在當代條件下調整自身位置的重要案例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 Lawas 地區的田野經驗中，樹皮布的文化意義往往並未被明確地加以論述或象徵化說明。對多數工藝實踐者而言，樹皮布之所以重要，似乎並非因其承載了可被清楚說明的符號系統，而是因其長期存在於生活之中，成為一種「理所當然」的文化實踐。這樣的狀態，反而對研究者提出新的挑戰：**當文化意義不被刻意言說時，研究應如何理解與書寫？**

因此，此計畫並不以還原「正確的文化意義」為目標，而是嘗試透過當代田野觀察，理解樹皮布如何在不同情境中被使用、被轉化，甚至被重新想像。本研究關注的核心問題包括：

第一，Lawas 地區樹皮布工藝在當代的材料選擇、製作流程與生產結構為何？這些實踐如何回應當地環境條件與社群組織方式？

第二，樹皮布在當地社群中如何被理解與使用，其文化意義如何在實踐中被保留、簡化，或刻意不被說明？

第三，作為一名以樹皮布進行創作的藝術家，這樣的田野經驗如何回饋並形塑我的創作方法，使研究不僅止於紀錄，而能成為未來藝術實踐與跨文化交流的行動起點。

透過上述問題意識的設定，本研究希望在避免將工藝浪漫化或定型化的前提下，呈現樹皮布作為一項仍在變動中的文化實踐，並為後續的研究與創作保留持續修正與深化的可能性。



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田野設計



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取向，結合田野調查與研究型藝術實踐（research-based artistic practice），透過短期但密集的實地行動，嘗試理解樹皮布工藝在當代社會中的實際運作狀態。研究並不以驗證既有理論或建立普遍性結論為主要目的，而是透過進入工藝現場、與實踐者交流，以及反覆回看自身位置，讓研究問題在田野過程中逐步浮現與調整。

本次田野調查於 2025 年 6 月 17 日至 6 月 22 日進行，主要場域位於馬來西亞東部砂拉越 Lawas 地區，並延伸至 Kampung Tang Itong 樹皮布工坊、Kampung Tok Dayang 社群空間，以及砂拉越原住民聯合豐年節、熱帶雨林音樂節、婆羅洲文化博物館與古晉印尼邊境市集等地。這些場域分別對應樹皮布工藝的生產、展示、節慶與流動狀態，使研究得以在不同層次中觀察工藝如何進入生活、文化活動與公共空間。

研究方法包含工坊拜訪與參與式觀察、半結構式訪談、非正式對話，以及同行回顧與討論。工坊拜訪使研究者能夠實際觀察樹皮布的製作流程、工具使用方式與工作節奏，並理解工藝如何在社群分工中被完成。半結構式訪談對象包含樹皮布工藝者 Suut Kurus、Johnny Suut，以及 Kampung Tok Dayang 村長 Angela Mikie Labak，訪談內容涵蓋工藝歷史、材料來源、製作技術、文化用途、政府支持與當代挑戰。這些訪談並非為了蒐集單一敘事，而是作為理解不同角色如何看待同一項工藝的重要參照。

除正式訪談外，研究亦重視非正式對話在田野中的作用。許多關於工藝日常性、情感連結與社群關係的理解，往往發生於訪談結束後的閒談、共同用餐或行走於村落之間的片刻之中。這些非正式交流雖不一定被清楚界定為「研究資料」，卻在實際上影響研究者對工藝位置的理解，因此被納入整體分析視角之中。

作為一名以樹皮布進行創作的藝術家，研究過程中亦將身體經驗視為一種重要的理解方式。敲打樹皮時的節奏與回饋、材料在手中的重量與阻力、長時間行走於工坊與村落之間所累積的身體疲勞，以及在節慶與音樂現場中產生的共振感，皆成為理解工藝如何與生活節奏交織的線索。這樣的身體經驗並非用以強化感性敘事，而是作為補充語言難以完全描述之處的一種研究途徑。

同時，本研究亦意識到田野時間有限所帶來的限制。六天的密集田野無法全面涵蓋工藝的所有面向，也無法取代長期駐地研究所能累積的深度。因此，本研究將自身定位為一個階段性的觀察，所提出的分析與理解，皆被視為暫時性的結果，並保留在未來透過回訪、交流與創作實踐進一步修正與深化的可能性。



第三章 LAWAS 地區樹皮布 工藝系統分析



Lawas 地區的樹皮布工藝，並非以單一匠人或個別技術作為核心，而是由材料取得、製作流程、工具系統與社群組織共同構成的一套實踐網絡。理解此一工藝系統，必須同時關注其物質層面與社會層面，並將工藝視為一種嵌入生活結構之中的行動，而非孤立的技術展示。

在材料層面上，Lawas 地區的樹皮布主要取材自一種具有高度地方性的樹種。受訪的工藝實踐者指出，該樹種在砂拉越並不普遍，並非可隨處取得的材料。工藝者需進入叢林中尋找適合的樹木，並依長期經驗判斷其大小與成熟程度，以避免選用過老或過嫩的樹幹，影響樹皮厚度與纖維品質。這樣的材料選擇並非依循書面化的規範，而是透過世代累積的實作經驗逐步形成。

然而，材料的可得性並非穩定不變。多位受訪者皆提及，近年來適合製作樹皮布的樹木數量逐漸減少，主要原因包括叢林面積縮減、缺乏系統性的照護與補植機制，以及土地使用方式的轉變。這樣的現象使工藝者開始意識到，樹皮布工藝的延續不僅是技術是否被學會的問題，更與土地治理、生態管理與政策支持密切相關。在此情境下，工藝實踐逐漸顯露出其對自然資源的依賴性，也凸顯工藝與環境之間難以分割的關係。

在製作流程方面，Lawas 地區的樹皮布工藝呈現出與部分南島地區不同的技術選擇。當地工藝者並未採用常見的浸泡水中處理方式，而是以「燒」與「敲」作為主要手法。工藝者會在叢林中生火，略為燒過樹皮以去除乳汁，或透過持續敲打，使樹皮逐漸與樹幹分離。這樣的處理方式，顯示技術並非單一南島系統的直接延續，而是因應當地環境條件與材料特性所發展出的在地實踐。

敲打過程本身亦具有節奏性與身體性。敲擊的力道、頻率與工具的重量，皆需依樹皮狀態即時調整。這樣的技術難以透過文字或圖像完整傳達，而必須在反覆實作中逐漸體會。從田野觀察的角度來看，這樣的製作方式也顯示，樹皮布工藝並非僅存在於成品之中，而是深深嵌入製作過程所形成的身體記憶與動作知識。

在工具層面上，Lawas 地區的工藝者多使用自製工具，而非市售器具。工具通常取材自枯木或現地材料，依使用者需求進行雕刻與調整。工具表面留下的痕跡，往往與敲打後的樹皮紋理相互呼應，形成一種難以被簡化為裝飾或功能的關係。這樣的工具系統顯示，工藝並非單向地「製作物件」，而是在工具、材料與身體之間形成持續互動的過程。

在生產與組織結構方面，Lawas 的樹皮布工藝並非完全依賴個別匠人獨立完成，而是透過社群分工與集中販售的方式運作。多數家庭在家中完成敲打與初步處理，成品或半成品再被集中至工坊進行縫製、整理與販售。工坊在此不僅是生產空間，更扮演協調節點的角色，連結家庭製作、市場需求與外部資源。

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支持，亦成為此一工藝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。自 1990 年代後期起，地方政府協助建立工坊空間，並提供縫紉機等設備，使部分加工程序得以在家庭中完成。這樣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產效率，也使工藝得以在當代經濟條件下維持運作。然而，這樣的制度安排同時也改變了工藝的節奏與分工方式，使工藝逐漸朝向可被市場吸納的形式調整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工藝者對於這樣的轉變多持審慎態度。一方面，集中化與設備支援有助於減輕勞動負擔，另一方面，工藝者亦擔心過度追求效率，可能導致技術細節的流失。這種在維持品質與回應市場之間的拉扯，並未被視為需要立即解決的問題，而是成為工藝實踐中持續協商的一部分。

綜合而言，Lawas 地區的樹皮布工藝並非靜態的「傳統技藝」，而是一套在材料、技術、工具與社群組織之間不斷調整的實踐系統。理解此一系統，有助於跳脫將工藝視為單一文化符號的視角，轉而關注工藝如何在當代條件下，透過實際行動回應環境、經濟與社群關係的變化。



第四章 文化用途、設計觀與差異的實踐方式



在 Lawas 地區的田野觀察中，樹皮布最顯著的特徵之一，在於其文化用途的明確性。相較於部分研究語境中，樹皮布被高度象徵化或抽象化的描述方式，Lawas 的樹皮布多半被直接視為「可使用之物」，其文化意義並非透過複雜的詮釋體系被強調，而是透過實際使用情境被自然地延續。

樹皮布在當地最常見的用途之一，是作為婚禮中的贈禮。受訪者指出，樹皮布在過去主要作為衣著材料使用，隨著布料取得變得容易，其日常穿著功能逐漸降低，但在婚禮中作為贈送新娘的禮物，反而成為當代重要的文化實踐。這樣的轉變並非來自外部規範，而是在生活條件改變的過程中，逐漸形成的使用方式調整。

除了婚禮場合，樹皮布亦常出現在節慶活動與文化展示之中，例如倫巴旺族的年度慶典或地方文化活動。此時，樹皮布多以背心、帽子或配件的形式被穿戴，其功能既包含辨識族群身分的作用，也兼具實際穿著的便利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些服飾並不被視為「復刻傳統服裝」，而是被理解為在當代情境中，仍然可被使用的文化物件。

在設計觀念上，Lawas 地區的樹皮布製品呈現出相對保守且一致的風格。受訪者提及，紅色、黃色與藍色是最常被使用的顏色，這樣的配色並非來自抽象的象徵系統，而與過去可取得布料顏色的限制有關。由於早期布料與染料來源有限，這些顏色成為最容易取得的選項，並在長期使用中逐漸被視為「傳統」的一部分。

這樣的設計選擇，顯示出傳統並非一開始即被賦予象徵意義，而是在反覆實踐中逐漸被固定下來。當研究者詢問顏色是否具有特定象徵時，工藝者多半並未給出明確的文化解釋，而是回應「一直以來都是這樣使用」。這種對設計選擇的態度，顯示文化意義並非總是需要被清楚言說，而可能以一種不被特別標示的方式存在於日常實踐之中。

在與其他南島地區樹皮布工藝進行比較時，這樣的「不強調差異」特質顯得尤為明顯。相較於部分地區對圖紋、符號與敘事的重視，Lawas 的樹皮布多半保持相對簡潔的表面處理。這並不意味著當地缺乏設計能力或文化層次，而可能反映出不同社群對於工藝功能與美學重點的不同取向。

對研究者而言，這樣的差異同時也是一種提醒：並非所有文化實踐都以「可被清楚說明的象徵系統」為核心。有些工藝之所以重要，正是因為它們被視為生活的一部分，而非需要被不斷解釋的文化標誌。在 Lawas 的情境中，樹皮布的文化價值，往往存在於其被自然使用、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狀態之中。

因此，本研究並不試圖以單一標準衡量樹皮布的文化深度，而是嘗試理解不同社群如何依自身生活條件與需求，發展出各自的使用方式與設計觀。這樣的理解，也為後續討論樹皮布在當代如何面對創新與轉化，提供了重要的背景。



第五章 當代挑戰、創新嘗試 與未來想像



在 Lawas 地區的田野觀察中，樹皮布工藝的當代狀態並非單純的延續或衰退，而是呈現出多重力量同時作用的情形。一方面，工藝仍被社群視為重要的文化實踐；另一方面，工藝者亦清楚意識到，當代生活條件的改變，使得樹皮布不可能完全以過往的方式持續存在。這樣的矛盾與調整，構成了工藝實踐者在當代所面對的主要挑戰。

最直接且反覆被提及的挑戰，來自原材料的取得。隨著叢林面積縮減、土地使用方式改變，以及缺乏系統性的樹木補植與管理機制，適合製作樹皮布的樹木數量逐漸減少。受訪者多次提到，雖然該樹種具有再生能力，但若缺乏有意識的種植與照護，長期而言仍可能出現原料不足的情況。這樣的擔憂，顯示工藝延續的問題已不再只是「是否有人學會技術」，而是牽涉到更廣泛的環境與政策層面。

除了材料問題，工藝知識的傳遞亦面臨新的條件。雖然受訪者普遍表示製作樹皮布並無性別或年齡限制，且願意將技術分享給有興趣者，但實際上，真正願意長時間投入學習的年輕人並不多。這並非因為工藝本身缺乏價值，而是因為年輕世代面臨不同的生活選擇與經濟壓力，使工藝學習不再是唯一或必要的路徑。

在此背景下，「創新」逐漸成為工藝者與外部支持單位經常提及的方向。然而，田野觀察顯示，創新並非一個被清楚界定的概念，而是涵蓋多種尚在嘗試中的想法。例如，有工藝者提到，希望能透過機械輔助來減輕敲打樹皮的勞動強度，或嘗試使用滾輪、馬達等方式提升效率。這樣的嘗試，並非為了取代手工，而是在維持品質的前提下，尋找更可持續的製作方式。

然而，對於是否應全面引入機械化，工藝者多持保留態度。一方面，機械被視為可能協助工藝進入更穩定生產狀態的工具；另一方面，過度依賴機械也可能導致技術細節的流失，使未來世代難以理解完整的製作流程。這樣的拉扯並未被視為需要立即做出選擇的問題，而是被放置在持續觀察與試驗的狀態之中。

在產品形式的創新上，Lawas 地區目前最成熟的發展，仍集中於帽子、背心等既有形式的改良。牛仔帽等新型態產品的出現，並非來自外部設計介入，而是在既有使用習慣中，逐步調整外型與結構，使其更符合節慶與日常穿戴需求。這類產品的成功，在於其兼顧文化辨識度與實用性，使樹皮布得以進入更多使用情境。

相較之下，對於更大幅度的形式轉換，例如將樹皮布運用於居家用品、藝術創作或高端時尚領域，工藝者多半抱持開放但尚未具體實踐的態度。有些受訪者提到，若能引入適合的印刷或加工設備，或許能發展出更多產品類型，但這樣的構想仍停留在想像階段，尚未成為社群共識。這樣的狀態顯示，創新並非缺乏，而是仍在等待合適的條件與合作方式。

在對未來的想像中，「被看見」是一個反覆出現的關鍵詞。多位受訪者表達，希望樹皮布能被更多人認識，不僅限於倫巴旺族內部使用，也能被外部社群理解與欣賞。然而，這樣的期待並不意味著希望工藝被完全市場化或商品化，而是希望在保持文化尊嚴的前提下，讓工藝獲得持續存在的空間。

這樣的未來想像，亦體現在對空間的期待上。受訪者提及，社群正規劃新的建築空間，期望未來能整合展示、製作與交流功能，使樹皮布工藝不僅是生產活動，也成為對外溝通的平台。這樣的構想，顯示工藝未來的角色，可能不再僅限於物件本身，而是成為連結社群、藝術家與訪客的媒介。

總體而言，Lawas 地區的樹皮布工藝正處於一個未定型的狀態。當代挑戰、創新嘗試與未來想像並非線性發展，而是交織成一個持續協商的過程。本研究並不試圖判斷何種方向才是「正確的發展」，而是將這些尚未完成的討論視為工藝持續活著的重要證據。



第六章 從調查到創作：後南島的轉譯方法

研究與創作之間的行動起點



本研究並未將田野調查視為一段可被完成並封存的研究行動，而是理解為一個持續生成中的過程。對我而言，Lawas 地區的樹皮布工藝田野，並非提供了一組可直接轉化為結論或創作主題的素材，而是促使我重新思考「研究如何轉譯為創作」這一問題本身。正是在此脈絡下，「後南島」並非作為一個既定理論框架被套用，而是作為一種轉譯方法，在田野經驗與創作實踐之間逐步形成。

在本研究中，「後南島」並不指向一個單一文化源頭或線性遷徙敘事，而是一種觀看與行動的方式。它允許研究者在不同南島社群之間移動，承認差異的存在，同時避免將差異簡化為文化分類或風格對照。Lawas 的田野經驗，使我更清楚地意識到，樹皮布工藝並非一項可被抽離其生活脈絡而被比較的技術，而是一種深度嵌入土地、材料、勞動與社群關係中的實踐。因此，創作的任務並非「再現南島」，而是思考如何在當代情境中，回應這些正在發生的關係。

從調查到創作的轉譯，首先體現在對「未完成狀態」的保留。田野中所觀察到的樹皮布工藝，並未呈現為一個穩定、完整且自我解釋的文化系統，而是充滿協商、調整與尚未確定方向的實踐。後南島的轉譯方法，並不試圖修補這些不確定性，而是將其視為創作中可以被保留的重要條件。未來的創作實踐，將不以總結田野為目標，而是讓作品本身成為一個持續開放的狀態，承載尚未被說清楚的經驗。

其次，轉譯並非發生於文本與作品之間，而是發生於行動層次。Lawas 的田野經驗提醒我，許多關於工藝的重要理解，來自於製作過程中的身體節奏、材料回饋與集體勞動的時間感，而非語言層面的詮釋。因此，在後續創作中，調查行動本身——行走、採集、敲打、縫製、等待——將被視為創作的一部分，而不僅是創作前的準備階段。創作在此不再是研究成果的呈現，而是研究方法的延續。

在此意義下，「後南島」亦是一種拒絕過度代表的立場。作為來自台灣、以樹皮布進行創作的藝術家，我並不將自己視為能夠為不同南島社群發聲的主體。相反地，轉譯的工作在於建立一個可被回訪、可被修正的交流框架，使創作成為促成對話的媒介，而非替代他者發言的工具。

Lawas 的工藝實踐者對於文化意義的低度言說，反而提醒我，創作可以選擇不解釋過多，而是讓材料與行動本身保留其沉默與重量。

基於上述理解，本計畫所提出的研究與創作銜接方式，並非一套封閉的方法論，而是一個可被持續調整的行動起點。未來的實踐將包括再次回訪田野、與工藝實踐者進行共同製作、以及透過展覽、工作坊或行為式創作，延續田野中已建立的關係網絡。這些行動並不以立即產生可量化成果為目標，而是作為長期研究與創作並行的過程。

總結而言，從調查到創作的轉譯，並非將田野經驗轉化為視覺語言或形式元素，而是透過後南島的視角，重新安排研究者、材料與社群之間的關係。Lawas 的田野並非一段已完成的研究案例，而是成為未來行動的起點，使研究與創作得以在未定型的狀態中持續展開。

